

“天才编辑”的消失与编辑学研究的困境

2005-11-28

作者： 吴飞
关键词： 编辑学 | 阅读：712次 |

早期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并没有专业性的编辑人员，文化传播的主力军是那些卜筮官、乐师以及史官等。西周王室就设有“天府”，掌管祖庙的守护和文献簿册的保存，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称“柱下史”，当然算不上专职的编辑。编辑二字连用，论者多称始见于《南史·刘苞传》中“手自编辑”一语，这里的“编辑”指的是刘苞，他因“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故亲手修补，应该说，他的这种工作与现代意义上的编辑工作还相距甚远。有学者认为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先秦诸子的著作，多由其弟子、再传三传弟子或亲属与仰慕者所编成，这些无名氏做的事已经接近编辑工作了，但我们没有办法详察当时的情况，所以我认为要下结论说这些人就是编辑为时尚早。至于更多的人称司马迁是编辑，我也持保留意见。因为司马迁编《史记》与其说是编辑工作，不如说是编著工作。

一、现代新闻出版业推生了专门编辑家

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编辑，我认为是刘向和刘歆。他们根据《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流行的不同本子，整理校订、精选汇集成《战国策》一书，已经与现代意义上的编辑相差无几了。其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和他周围的文学之士，编辑了《文选》，写了《文选序》，说明编选的原则和方法。再往后，李阳冰为李白编《草堂集》，李汉为韩愈编《昌黎先生集》，刘禹锡编《柳宗元文集》，元稹编《白香山集》，杜牧编《李贺集》，更是名符其实的编辑工作了。但他们的编辑活动与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活动还是有区别的，即他们都不是专业性的活动，他们的编辑活动基本上是作家、学者个人的活动，或出于爱好，或受政府任命。

南宋而后及至明代，雕版印刷盛行，商品经济发达，手工业城镇中市书坊铺兴起，出现了受聘于书铺、适应市场需要的编辑，明末苏州冯梦龙即是代表。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时期，沿海通商口岸有外人经办的华文报刊出现。参加编辑工作者，前有梁亚发，后有王韬。在清末戊戌维新运动时及其后，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职业编辑了，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等。这些人逐渐成为文化传播活动中最重要的角色，对中国文化的启蒙与社会的发展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美国专业性的新闻编辑的出现大概在独立战争时期，此前美国报业的经营者大多是些印刷商，这些人业务水平不高，办报的动机无非是想拓展其印刷业务，因此报章上的内容多是东抄西摘，鲜有独创。独立战争胜利后，“专门编辑”陆续粉墨登场了，据黄旦教授的考证，“编辑”的来源似有二：一是某党派推荐或者所请，如《美国公报》主编芬诺（Fenno）就是由联邦党人推荐的。另一种则是自己投身所好，且更多地是为政治目的选择这一职业的，如富兰克林的外孙巴彻（Benjamin Franklin Bache）。[1] 初期的“专门编辑”大多是政治型的编辑。不过，随着美国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新闻工作的自觉，美国在20世纪初，一批真正理解新闻传播理念的伟大编辑也应运而生了。如美国《纽约时报》的巨人般的编辑——卡尔·范安达（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将会多次提到他的名字）终于可以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情，将一份并不出色的《纽约时报》办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报纸。

二、天才的编辑形象的出现

编辑变成公众人物是在《戴维·哈伦》一书的走红之后的事，当时一位叫韦斯科特的银行家写了一本小小说，在多家出版社碰壁之后，到了阿普尔顿出版社（Appleton）的编辑希契科克手中，希契科克对原稿进行了加工：他更动了几个章节的次序、对全书做了些修改，并对文体进行了一些修正。小说经他编辑后，创造了出版奇迹，《戴维·哈伦》很快成为畅销书，到1946年，精装本总销售量达119万册，同时平装本也达24.1万册 [2]。至20世纪30年代，有关编辑的的各种文化神话也逐渐形成：编辑是抓得住手稿灵魂的救世主，编辑是点石成金的炼金术士，编辑还是先知，能看出他人的疏漏之处。而“天才编辑”珀金斯、康明斯等的出现，则将编辑的典范形象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心中，因为他们的编辑形象表征着：编辑作者的朋友，他是挖矿人，是魔术师，是一位愉快的同伴，他们对于作者和书籍总从给予永不疲惫、英雄式的专注和投入 [3]。

在中国，天才编辑（如邹韬奋、张季鸾等）形象的出现，基本上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被周恩来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张季鸾（1881-1941），名炽章，笔名一苇，陕西榆林人。先后担任《大共和日报》的编译、《民信日报》总编辑、《中华新报》总编辑和《大公报》的总编辑兼副经理 [4]。一生除了嗜好昆曲以外，实在没有什么其它兴趣爱好。

“他的心思全在办报上，只有办报，才是他人生的最大抱负和最大乐趣” [5]。他为大公报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他在《本报同人之目的旨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宣告了与当时众多政党报刊和商业报刊不同的办报立场和经营方针 [6]。“四不主义”可以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立重要标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jin 文章 jin 动态

SEARCH >>

上一篇 PREVIOUS

MORE >>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下一篇 NEXT

MORE >>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 2006-05-29

一、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动态 NEWS

MORE >>

-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 “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 2009-09-27
- 第三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 2009-09-27
- 第九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 2009-09-24
- [更新]2009“中国新闻传播学科 2009-08-31

志。

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余江，杰出的报刊编辑出版家。韬奋小学时就立志当新闻记者，大学毕业后进了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6年10月接编该社主办的《生活》周刊，从此开始了新闻出版生涯 [7]。邹韬奋在1926年出任《生活》主编后，调整了内容取向，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中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对于编排方法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生活》周刊上的稿件许多是由邹韬奋自己撰写，他用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传记、职业修养的文章、小品文，还有问题讨论……除了勤奋写作之外，他还兼管封面设计、广告、发行、校样，还要拆阅、回复读者来信，经常干到夜里十一二点。在邹韬奋的精心培育下，《生活》周刊一天天地发展起来，发行量由二千份激增至4万份，1932年发行量更是高达15万多份，为当时全国期刊之冠。 [8]

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日益发达，编辑在新闻出版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突出，编辑角色也开始出现更专业化的分工，从现在的情况看出现了策划编辑、一般编辑、文字（文稿）编辑、组版编辑之分。这种专业化的分工，适应了现代新闻出版业企业化大产生的需要，也当然是社会文化传播发展催生下的产物。

三、消失的背影——“天才的编辑”

种种迹象表明，天才编辑的形象已经在现代传播工业的生产环节中逐渐消失了，珀金斯与邹韬奋等我们曾经为之感动的编辑形象已经消隐在电脑和高速运转的印刷器之后。美国著名的出版经纪人柯蒂斯(Richard Curtis)指出：“今天的编辑与老一靠编辑不同的是，他们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既要精通书籍制作、行销、谈判、促销、广告、新闻发布、会计、销售、心理学、政治、外交等等，还必须有绝佳的编辑技巧。而编辑工作又包括了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活动，其中许多工作几乎无法让人联想到过去坐办公室里埋头校对的编辑刻板印象。” [9]

国内也有学者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竞争将越来越激烈，编辑工作的内涵不断地扩大，过去编辑主要负责出版物的加工，工作较为单纯；现在却复杂多了，编辑们不得不参与出版的全过程，“从创意开始，到市场调查，提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选题，确定读者群，物色、组织作者，从书稿的文字加工，装帧设计，到制定宣传、促销计划，协助发行，各个环节编辑都得参与” [10]。但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现代编辑——无论是新闻编辑还是图书编辑——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搅得精疲力竭，有出版评论家指出：“今天的编辑不再具备对于工作的自豪感和下苦功的精神。”有些人甚至认为，今天的编辑什么都做，就是不做编辑工作，“新一代的编辑轻视文字编辑工作和书籍制作上的细节，而出版业所有权的日趋集中和竞争愈演愈烈，使得出版社面临了巨大的时间和金钱压力，不再重视书籍的制作水准。” [11]

罗杰斯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几年前，你很少会在一本书里面看到编排上的错误，现在随便拿起一本书，里面都充满了各种难以想像的错误。” [12] 中国的编辑也不再能独守孤灯，全心全意地修改他的人文章了，他们千方百计找来校对软件来应付辛苦而寂寞的校对工作，或者委托给社外人员来处理，出版物上的差错之多，已经习以为常了。如果鲁迅泉下有知，我想他一定会为“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书”的现实大为愤怒；如果张季鸾还在世，那他一定会为报刊上低劣的标题痛心疾首。

四、编辑学应该如何应对？

如何理解编辑形象的这种变化？人们对编辑角色是期望是什么？编辑在社会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编辑如何处理文稿？编辑与作者之间、与经纪人之间、与同事之间、与同行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呢？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编辑角色呢？商业力量对编辑的冲击和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编辑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和修养？新时期，我们应该怎样做编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回答。编辑学就是对这类问题不断进行思考的产物。

从外国的情况看，大多数的编辑研究著作重于流程和编辑艺术，这从许多编辑学著作的名书就看出端倪来，如《编辑的艺术》、《如何选择新闻》、《现代报纸设计》、《创造新闻编辑》、《编辑原理》、《今日编辑》等等，这些著作非常实用，如美国著名的编辑格罗斯主编的编辑业务著作《编辑人的世界》，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编辑的角色的，重于编辑在出版界的作用、编辑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编辑的职业伦理等等；第二部分是编辑工作现场论，集中分析和介绍了选书编辑、策划编辑、文稿编辑、文字编辑、编辑顾问等在编辑工作中的主要分工情况；第三部分是各种不同类型出版面观，介绍不同的出版物类型的编辑出版工作的注意问题。

有资料表明，“编辑学”这一概念不是西方社会的产物。林穗芳先生认为，日本和法国虽然在1969年和1981年创造了editology 一词，直译成汉语为“编辑学”，而实则是“出版学”。因而，林穗芳先生在1986年另行创造了一个新词redactology作为“编辑学”的国际通用语，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13]。1990年美国《克利夫兰旗帜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研究编辑工作的团体》（《Chinese Groups Studying “Redaction”》）的报道。其中写道：“我想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近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编辑学。在全世界一直对编辑出版工作进行研究，但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严整的学问加以深入研究是很少见的。最近几年中中国编辑界开始研究编辑学，因而创造了redactology 这个术语。自这门新科学在1983年开始兴起到现在，已有一些编辑学刊和十几种编辑学书籍问世。” [14] 说中国人创造了“编辑学”的概念，同国人创造了“新闻理论”的概念可能具有相似之处，西方人有研究编辑与新闻采访写作的，但他们不叫“学”，中国人则喜欢将这类东西称之为“学”，大概是一种具有一种深层的文化意味吧 [15]。

从国内的情况看，早在1922年6月4日，就有一位叫张维周的在北京《晨报》“新闻纸问题号”专版发表了《编辑新闻之我见》的文章；1926年，周孝庵出版了《如何编辑新闻》；1928年张九如、周嘉青出版了《新闻编辑法》（上海中华书局3月初版，1933年5月再版）；1929年潘公弼又发表了《新闻编辑法》[16]；1933年，郭步陶 [17]先生就写有一本《编辑与评论》的著作 [18]，这些成果表明，中国的新闻编辑学研究已经开始起步了。

之所以新闻编辑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是与当时报纸编辑思想之混乱有关，当时中国的新闻界，编辑方针不确定、编辑方法守旧，对新闻常常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而结果是新闻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受众的兴趣也没有得到重视，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误导了新闻记者，让他们以为新闻就是有闻必录，不必考虑新闻价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精编主义”，即在新闻编辑中，“应以新闻价值为标准，苟有价值，应详为登载。否则绝对不应刊载。”[19]在20世纪50年代，“编辑学”这一概念也已在中国出现了。[20]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的香港和台湾也先后出版过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张觉明的《现代杂志编辑学》、陈石安的《新闻编辑学》和荆人的《新闻编辑学》，还出版过陈世琪的《英文书刊编辑学》。[21]

但真正有意识地将“编辑学”当作一门科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的事。1983年，胡乔木致函教育部，要求试办编辑学专业，他指出：“编辑是编辑，出版是出版，出版离不开编辑，但编辑是独立的学问”。[22]同年，钱学森在一次讲话中也强调“编辑工作是一门科学”，要研究它的规律，“创造出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编辑学”

[23]。其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相继开办编辑学专业，中国的编辑学研究也渐入佳境。据统计，到2000年初，在书名上带“编辑学”字样的著作有80余种 [24]。如果加上在书名上不带“编辑学”字样的编辑学研究著作，则要多得多。这些编辑学著作有通论性的，如《编辑学通论》、《编辑学概论》、《编辑学原理》等；有依媒体或学科性质分类的，如《报纸编辑学》、《图书编辑学》、《杂志编辑学》、《学报编辑学》、《新闻编辑学》、《广播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科技编辑学》、《文艺编辑学》等。研究书刊编辑学的所占的比重最大，内容多是按照选题、组稿、审稿、加工等这样一些编辑工作程序写述的 [25]。另有还出版了一些以编辑过程的某个工作环节为主题的研究著作。“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出现了新的传播媒介，传统媒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为编辑学的分类研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例如：新世纪的图书编辑，读图时代的图片编辑，以及数字化时代的电子网络编辑等。” [26]

与此同时，研究论文也逐渐增多起来，研究阵地也在大家的努力下慢慢增多起来，如2003年《中国编辑》杂志正式与大家见面了。而原有的《编辑学刊》、《编辑学报》等刊物也先后改版，容量有所增加。其他刊物如《中国出版研究》、《出版科学》等也发表了不少编辑学方面的文章。还有一个更令人高兴的事是研究队伍也在逐年扩大，一些高等院校相继开出了编辑学专业，并有院校招收编辑学方面的硕士生。这些都为编辑学研究的繁荣添了一份彩。对此有人总结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学研究起步、崛起的年代，那么在90年代即20世纪最后10年则是编辑学研究深化、发展，结出更多硕果的年代” [27]。

不过，虽然编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少清楚的人士还是认识到，“要使出版学、编辑学成为能得到像传播学现在享有的那种程度的社会承认，没有5年、10年是不行的” [28]。我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到目前为止，编辑学研究领域中许多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如编辑概念、编辑学科性质、体系、范畴、研究对象及其具体内容等都存在着大量的争论和分歧，有些观点甚至全然对立。虽然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初期，这一现象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但多少也说明了我国编辑学学科的建设还任重而远。从整体上看，编辑学的研究不深入、不系统、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编辑学研究者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 [29]。

就新闻编辑学的研究框架看，大多数著作的结构相似，内容也相似，虽然近几年出版的几本书有一些内容拓充，如蔡雯参与编写的几本，都加强了编辑策划的内容，胡武的那本编辑学教材增加了电子媒体新闻编辑的内容。这些变动是必须的，因为现代新闻编辑实际已经含盖了这些范畴，编辑学研究自然要紧跟实践发尽其所有的需要。但我认为，这些变动仍然是不够的。变动不大，就意味着我们研究的进展开拓不大，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探索。

注释：

[1] 黄旦：独立战争前后的美国报刊思想之演变，载《新闻大学》1999年秋季号。

[2] 引自[美]格罗斯主编：《编辑人的世界》，齐若兰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3] [美]格罗斯主编：《编辑人的世界》，齐若兰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4]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页。

[5] 高集：忆我的姑父张季李二三事，载香港《大公报》2002年6月17日。

[6] 学者们对这一方针及方针指导下的《大公报》评价颇高，如李金铨认为，“在二十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所揭橥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等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 favor, without fear)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媒介专业主义’(media professionalism)的基本精神。”(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38页。)

[7] 参见沈谦芳著：《邹韬奋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8]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0日第七版。

[9] 转引自[美]格罗斯主编：《编辑人的世界》，齐若兰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0] 王雅红：也谈“策划编辑与编辑策划”，载《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5期。

[11] [美]格罗斯主编：《编辑人的世界》，齐若兰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2] 转引自[美]格罗斯主编：《编辑人的世界》，齐若兰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3] 1990年出版的姜振寰主编的《交叉科学学科辞典》、1994年出版的《第六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论文集》，其中的“编辑学”均译为redactology。1992年10月通过的中国编辑学会章程第一条把中国编辑学会的名称定为China Redactology Society。1990年8月26日美国《克利夫兰旗帜日报》有一篇关于中国编辑学研究情况的报道，文中的“编辑学”也采用了林穗芳先生所创的redactology。

[14] 林穗芳：关于“编辑学”国际用语定名问题的通信，载《编辑之友》1996年第2期，第18-19页。

[15] 许多在中国被称为“学”的东西，往往在西方被称为“艺术”与“学术随笔”，他们的“学”基本上用来指称那些实证意义上的研究成果。

[16] 潘公弼的研究实质上已经涉及到了编辑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他认为，想要制作良好的新闻，编辑方面不可不采取四个步骤，即收集资料、选择资料、整理资料以及由引而编成资料。（潘公弼：《新闻编辑法》，载黄天鹏编《新闻论集》，上海联合书局1929年10月出版）。

[17] 郭步陶，生卒不详，四川隆昌人。原名成爽，改名借，字步陶。1911年任《申报》编辑，1917年任《新闻报》编辑主任，主笔。1930年任复旦大学教授。

[18] 郭步陶的这本《编辑与评论》著作，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人称是我国第一部新闻评论学方面的专著（见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但书的相当篇幅是新闻编辑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他在编辑如何对待新闻与人这一方面的研究颇有创见，可以说是我国学者最早对新闻编辑进行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之一。

[19] 周孝庵：《新闻学上之精编主义》，载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光华书局1930年版。

[20] 从我们掌握的材料看，在我国学界，“编辑学”这个词是国民大学教授李次民先生于1949年3月在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的讲稿《编辑学》中首先提出的。李次民先生的这本书只在个别章节中讲到期刊的编辑工作，大量的篇幅是讲新闻编辑学，说明当时的报纸很重视编辑工作。另外，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苏联人撰写的编辑方面的书，即倍林斯基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不过有人认为，这里的“编辑学”是翻译的失误所致，因为俄文的原意是“编辑工作”、“编辑”的意思，没有“编辑学”的意义。

[21] 邵益文：编辑学研究评述，载《出版科学》2002年增刊（《出版科学年评（第一卷）》）。

[22] 转引自《叶圣陶研究会通讯》，第1期。

[23] 转引自张积玉等著：《编辑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24] 邵益文：编辑学，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载《编辑学刊》2001年第2期，第4页。

[25] 林穗芳：编辑学研究深化的可喜成果，载《出版科学》2000年第4期。

[26] 阙道隆：编辑学研究的新任务新课题，载《出版科学》2003年第2期。

[27] 邵益文：编辑学研究评述，载《出版科学》2002年增刊（《出版科学年评（第一卷）》）。

[28] 宋原放 赵斌：出版学、编辑学的研究已在中国起步——在第四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原载《中国出版年鉴》（1990—1991）。

[29] 参见吴飞：编辑学研究二十年评析，载《编辑学刊》199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出版工作》1999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收藏本文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0245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 返回首页](#)

[传媒资讯网](#) | [传媒学术网](#) | [传媒考研网](#) | [传媒博客](#) | [传媒社区](#) | [传媒书店](#)

| [关于我们](#) | [会员注册](#) | [交换链接](#)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 2001-2009 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Copyright © 2001-2009 Media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